

[首页](#) >> [哲学](#) >> [科学技术哲学](#)

## 李三虎:技术生成的哲学解析

2018年09月12日 09:46 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李三虎

字号

[打印](#) [推荐](#)

### Philosophical Accounting for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作者简介:** 李三虎(1964-),男,山西长治人,博士,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校刊部教授,校刊部主任,《探求》杂志主编,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政治伦理。广州 510070

**原发信息:**《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0181期

**内容提要:** 技术生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世界关系问题。目前一种流行的技术哲学观点是斯蒂格勒的人的身体缺陷及其技术弥补观点。但是,这一先验判断作为技术生成的一种向前的历史入场形式,必须要落实到人类脱离动物世界的向后追溯姿态上来,也即必须要强调生命是技术生成的条件。由此可以借用阿伦特的“生命活动”概念,将技术的生成展示为如下逻辑秩序。一是“劳动动物”诉诸劳动,逐步将自然物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代表着技术生成的原始起源;二是“工匠人”诉诸工作,开始将人工物世界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表明技术生成的加速效应;三是“社会人”诉诸行动,将自然物和人工物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表明技术生成具有集体的扩张性特征。这种技术生成的历史逻辑秩序,表明人与物是一种相互建构关系,与人一样,自然物作为能动者也进入技术生成过程,同时也要强调,劳动、工作和行动并不是一种相互替代关系,行动对工作、工作对劳动是一种包含或发展关系,因此技术的一切历史生成均会包含于当前的行动中。这里人和非人要素作为技术生成的能动者绝不会单独发挥作用,技术的生成机制在于一种包含能动者设想或被设想的目标、步骤和意向转换、人和非人能动者混杂以及能动者之间相互赋意在内的技术行动纲领。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a philosophical issue, is actually about the human-world relation. A popular view in this perspective, proposed by Stiegler, holds that technology is a remedy for the immanent deficiency of human body. However, this transcendental idea about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as prospect has to be ascertained in the retrospect of human being divorced from its animal nature. That is,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must be preconditioned by human life. With the aid of Arendt's conception of "vita activa" (life activity),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can be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animal laborans" takes natural things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ir existence; in the second stage, "homo fabers" put the production world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ir existence, which speeds up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in the third stage, "homo sociologicus" act collectively to put both natural things and artifacts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ir existence, which shows the expansionary character of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is logical order, in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human and the world are mutually constructed. Like human being, things are agenc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Action has the inclusive relation with labor and work. In other word,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in the past is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action. At this point, human and non-human factors cannot act individually, and the becoming mechanism of techn

**关键词:** 技术生成/生命活动/能动者/技术行动纲领/becoming of technology/vita activa/agent/action program

**标题注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X026)。

### 一、人类身体缺陷及其技术弥补

技术作为一种人工物实在，是制造之在、使用之在和背景之在，包含了各种价值关联，其居间作用表现为它对人一世界关系的调停意义。[1]这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问题是：技术是如何生成或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本来与人的生成问题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但是，自前苏格拉底的巴门尼德以存在问题(存在之存在)定位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后，西方哲学一直未能为此留下足够的哲学空间。所谓存在问题解决的是追求死亡和偶然之外不变的超验真理，哲学为此导向的是“不休之路，而不是变化或进化之道”[2]154。技术总是隶属于变化和现实范畴，也因此总是被哲学搁置一边。即使是柏拉图在寻求存在问题解决时，也将诗人和诡辩家这类技术人员看作纯粹的说谎者，因为他们总是在盲目地重复预先写好的演讲。对于柏拉图来说，这不仅滥用了对罗格斯的真理叙事权力，而且忘记了语言和文字的真正力量，以纯粹的技巧歪曲不变的真理。这种对技术的哲学压制情形，直到19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随着工业系统的迅速崛起，技术问题开始变得紧迫起来。不过，自那时以来，当人们沿着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哲学传统，把技术看作达到人类目的的唯一手段时，技术问题便表现为人类存在的命运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回到存在问题上，技术间性理论要求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变化的和实践的技术与追求不休的或永恒的人类在生成论上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对于这一问题，在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中存在两种不同解答。

(1) 古技术学观点，从经验的事实出发把技术看作人类的重要特征，认为技术有自身的独立进化路径，特定技术的发展逻辑由它存在于其中的技术体系决定。技术生成内在路径虽然也受到科学进步、经济需求甚至文化和政治条件制约，但其独特之处是技术在其自身的逻辑或机制中进化。

(2) 古人类学观点，从先验的世界出发把握永恒的人性和生命，认为人类最初是一个完整而纯粹的起源，随之而来的是变质、腐败和混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技术的生成。

古技术学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实体理论，由于它从技术发展自身的进程把握技术的生成，所以预设了技术生成对人类生成的优先性。古人类学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本质理论，由于它强调原本善的人性因原本恶的技术而走向沉沦，所以实际上预设了人类生成对技术生成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表明，人的生成即是人的死亡，人与技术的双重生成表现为死亡的逻辑。至少从技术的原始生成起源来讲，古技术学观点似乎表明技术生成无涉于人类的生成，但这并不符合历史的整个发端情况。古人类学观点强调技术生成与人类生成直接相关，至少表明技术生成与人类生成是同步的。就古人类学观点来说，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主张人类作为主体为了获得个性或人性，必须要以现世的方式(如技术的“座驾”)与自我发生关联，它的死亡是不能超越现世而经历未来的事件，以死亡为限的时间延展只是对个体生存的限定，任何超越当下的时间展开都不能构成人的终结性未来。但是，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的起源或生成表明，人类自身并不能实现那些被认为是人性或个性的东西——“超验的主体性”，主体性只有在人类构制其经验对象意义上才成为超验的东西。在他看来，人仅当其与“技术学”(technics)发生关联时才与时间发生关系：“如果说存在和时间的关系确实仅仅是在技术学的‘起源’视域(也即缺乏起源的视域)中展示的话，那么问题就成了把存在和时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技术关系加以思考。”[3]133

在时间意义上，技术作为人的存在和人作为技术的存在是一样的，因此必须要把技术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置于同一过程或范畴加以反思。这种反思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在斯蒂格勒看来，所谓技术学包括技巧、技术和技术客体，如前现代手工艺客体、前工业和工业技巧以及现代机器动力技术等，这些技巧和技术的构制历史的经验客体表达，因此并不存在没有历史的现世性。这里我们不能通过技术的历史生成演绎出先验的历史生成，但却能使人类与时间发生关联成为可能。斯蒂格勒为了在超验意义上同时反思技术和人的生成，采取了超验的神话叙事方式，把技术的生成包含在人的生成中。在西方创世神话中，有一种人类身体缺陷寓言——“爱比米修斯之误-普罗米修斯盗火”。在柏拉图转述的比《圣经·旧约全书》更早的创世传说中，造物主宙斯如同木匠制造桌子一样根据自身的“理念”创造了人和万物，但爱比米修斯作为造物主的执行者，由于自己的疏忽而忘记了赋予人类必要的生存能力和工具，所以他的兄弟普罗米修斯被迫为人类盗来智慧、技艺和火，作为身体缺陷的“代具”(prosthesis)。这一神话描述了人类从有缺陷的动物到这种缺陷因技术学而获得弥补的生成进程，也表达了斯蒂格勒的技术与人的相互塑造观点。[3]113这里涉及人和技术的“谁”与“什么”的关系问题，也即“人的发明”命题。这一命题具有双重含义——“谁”发明了“什么”和“谁”被“什么”发明。人的生成是从其身体缺陷开始的，是一种“过失”；技术的生成是对这种“过失”的弥补，是现世的和历史的伴生记忆物。技术的历史和人的发明“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技术的东西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的东西，技术的东西既是发明者又是被发明者”[3]137。

毫无疑问，斯蒂格勒通过“爱比米修斯之误-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声称的人的缺陷及其技术弥补观点是一种先验的论断，它“通过虚构性关联成为一个极好的技术哲学话语原型，如果不是通过神话的叙事，纯粹的自然之人又怎么能被沉沦之人、技术之人和社会之人所取代”[3]101。但是，这种神话叙事方法作为一种向前的历史入场形式，必须要落实到人类脱离动物世界的向后追溯姿态上来。当我们从技术观点看待动物史时，可以说，人类获得的完全新颖的伴随记忆，必然是一种类或物种跨越兽性的生命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激进的飞跃过程，又是一个连续过程。就技术的生成而言，生命是技术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生命呢？从早期形成来说，生命是一种负熵——它要与周围世界的无序作斗争或应对复杂环境，以便形成自己的生活秩序。在斯蒂格勒看来，解构主义哲学创立者德里达的“延

异”(difference)概念对理解生命有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延异”是产生差异的差异，它一方面表示两种事物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示这种差异包含的延缓和耽搁。生命就是这样一种延异，它在时间上是延缓的，在空间上随着遗传记忆的开端产生与周围世界的熵或混沌的差异。在无序的宇宙中，基因最早获得保留，并在某一时刻固定下来。德里达把这种基因保留称为书写形式或书写技术的开端，这种书写通过遗传密码或最早信息构成宇宙的一次现世行动。生命这种通常被认为具有绝对活力的东西，事实上是书写和永恒的开端。生命一旦开始或实际的生命形式一旦开始进化，随着神经功能的完善和提升，第二种书写技术——神经系统包含的躯体记忆技术也就生成了。正如遗传记忆一样，神经记忆构成了原始人的意识基础，且能“阅读”周围环境的现象空间，并能把这种阅读的记忆痕迹铭记在神经系统中。就躯体记忆保留一定时间而言，任何生命体都可以说是具有对外部事物的“预测”功能。生命体的世界表象包含以往的物的痕迹，承载着意义和被书写，因此标志着预测未来的技术和意识生成。当这种意识扩及周围环境事物时，生命体就开始为了被预测的目的，推动周围环境工具化或用代具装备自身。促使这种生成成为可能的认知“预测”，只有经历足够长时间的躯体记忆，整个技术系统和语言系统才可能由此成为人类在技术世界中保持和发展的社会和族类生活系统。例如，仅当我们有了多次用手艰难地挖洞的记忆后，才决定制造铁铲，铁铲作为技术客体也才由此成为挖洞的一种具身重复——反复用以挖洞的工具或人工物。斯蒂格勒把这称为生命体外化的“技术记忆”或适应预测目的的无机物质铭刻，生命就是通过“不同于生命的手段”得到追踪。[3]137在他看来，技术记忆是这样一种“延异”，即它开启了生命在非生命的技术上的展示或延生。在生命意义上，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形成，必然包含多重技术判定及其记忆。因此从简单生命到复杂生命，从动物世界到人类，这个进化过程包含了诸多技术的生成或记忆过程。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跳转到: [1](#) [前往](#)

## 作者简介

姓名: 李三虎 工作单位: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李秀伟)

## 相关文章

[首页](#) >> [哲学](#) >> [科学技术哲学](#)

## 李三虎:技术生成的哲学解析

2018年09月12日 09:46 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李三虎

字号

[打印](#) [推荐](#)

### 二、技术生成以生命活动为条件

人的身体缺陷及其技术弥补论述表明,生命是技术生成的条件。这一条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生命作为技术生成的条件,表现为技术生成于生命活动(vita activa);二是生命活动可以分为内在的生理活动和外部的身体活动,前者构成了其本能的技术生成(即内部技术记忆,如遗传记忆、神经记忆等),后者构成了外部的技术生成(即外部技术记忆,如语言文字、物质技术等)。前一含义表明,技术生成包含在整个动物的历史和人的生成过程中,涉及人的集体类属及其与动物世界的关联;后一含义则表明,对身体内部技术与外部技术的区分,主要应该限于人类生命个体范畴。但是,如果诉诸人类集体的生命活动,那么人类个体意义上的技术区分便会失去意义,因为即使是人类个体外部的技术也可以被置于人类集体的生命活动范围加以理解。事实上,我们很难从哲学上把握技术的个体记忆,而必须要诉诸技术的集体记忆才能探讨技术生成问题。为此我们可以启用阿伦特的“生命活动”概念,来理解技术生成的生命条件。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立论基础,是“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与“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区分。在她看来,理解这种区分,首先要理解与人类生命相关的“生命活动”与“生命沉思”(vita contemplativa)的基本区分。生命沉思诉诸怀疑追求真理,生命活动诉诸行动追求不休,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补充。但是,阿伦特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如何沉思,而是强调生命活动优先于生命沉思,也即把生命沉思带进生命活动的经验世界。因此她的政治哲学“只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再无别的目的”[4]5。阿伦特虽然是从政治角度讨论人类生存的条件或处境,但她并不打算参照人类的本质或自然属性:“人类是有条件的存在物,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人类接触,就立刻变成人类生存的条件。生命活动得以在其中耗竭的世界本身,由人类活动生产的物的世界构成,但这些专为人类而存在的物,常常制约着其制造者的人类。除了在地球上赋予人类以生命的那些条件和出自这些条件的条件外,人类也创造自身的条件。这种自己创造的条件因人类而生成并具有可变性,发挥着与自然物同样的调节力量。凡是接触和进入与人类生命的持续关系的东西,都表现出人类生存的条件特征,这就是人类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条件的存在物的原因所在。”[4]9阿伦特这里一方面表明人类以赋予其生命的自然物和人为的技术人工物为条件,人类生命活动因人类条件而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人类条件因人类的存在而生成,特别是技术人工物更是因人类生命活动而创造和生成。

从人类与物的复杂关系中,阿伦特观察到,人类生命活动的三个特征要素——生命本身、世界性和人类多样性。与此相对应,她进一步将人类生命活动区分为劳动(labou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她虽然以这三种活动形式表明人类克服死亡并实现不休的政治意图,但有关这三种人类活动形式的见解对我们理解技术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作为人类一种最为显而易见的基本活动,与人类生命密切相关,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人类诉诸劳动满足其生存需要,维系其生命存在。阿伦特指出:“人的生物学过程与世界的生长和衰退过程,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自然的循环运动,不断重复;一切源于必须要应对这些过程的人类活动都要受到自然的不断循环限制,可以说,它们本身无始无终;与工作达到目标时就会终止不同,劳动总是处于被生命有机体的生物学过程规定的同样循环运动中,它的‘辛苦和烦恼’只有在有机体死亡时才会终止。”[4]98劳动是一种生命循环运动,受生物需要控制。人类由此与动物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可以称为“劳动动物”。人类作为劳动动物,为了避免不受自然过程伤害,不得不以其“自然之手”从自然中取得所需之物并加以消费。[4]193的确,黑猩猩会使用树枝以便将白蚁从洞穴中取出,偶尔也用木棍杀死小羚羊,下雨时还会折断大树叶避雨;燕雀会使用树枝搭窝自居;即使是白蚁这类群居昆虫,也会利用某些自然的或制造适当的空间进行温度控制。这些都可以说是动物世界取得的原始技术成就,与人类使用代具遵循相同路径。

但是,人类作为劳动动物与其他劳动动物之间的差异在于,动物世界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物的使用上,对自己使用的自然物很少给予改进,人类则对其使用的工具或代具不断给予改进并且具有“技术意识”。1959年考古学发现了东非古猿化石,也称“东非人”。这一发现表明,东非人已使用石制工

具，但他们脑容量很小，没有超过猿类的硕大头骨。这个事实意味着东非人不是起源于大脑，而是起源于手，因此被称为“巧手人”(*homo habilis*)。巧手人通过手的劳动，不仅促进了语言的生成，而且还产生了代具性，进而加快了动物脱离自然的解放进程，使大脑皮层分裂和石制工具演变处于同一过程。从东非人到尼安德特人这一早期原始人时代，人类演变的实质在于大脑皮层扇面的展开，其直接的标志是工具形状的不断进化。当时技术生成动力虽然还停留在生物需要阶段，但其“技术意识”已清晰可见。例如，鹅卵石碎片展示的劳动行为，不仅是造成一个削切面，而且与此相应的是超前支配的技术意识。与其说技术是“人类身体和大脑的真正‘分泌物’”[3]150，毋宁说它是劳动的产物或结果。恩格斯曾经指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正是这种工具性劳动，将人类与动物世界区分开来。如果说一般的动物劳动维持的是保留自然物水准的原始技术的话，那么人类的动物劳动则启动了人工物水准的最小化技术文化进化。伊德举了塔沙代人和因纽特人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最小化技术，主要包括打猎用的弓箭和石斧、捕鱼用的鱼叉、摩擦生火煮食和取暖、用植物原料做成腰布遮体、用兽皮搭屋等。[5]14-15

从“巧手人”到“直立人”(*homo erectus*)再到现代“智人”(*homo sapiens*)，人类经历了相当长的进化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通过劳动一直缓慢地维持着与生命条件直接相关的最小化技术发展水平。这里劳动作为人类一种生命活动形式虽然也需要以世界性为条件，但明显以世界性为条件的人类生命活动形式是“工作”。人类的工作作为一种生命活动形式指向的是人类生存的非自然性，它提供了一种“明显不同于一切自然环境物的人工物世界”[4]7。只有诉诸工作，自然之地球才变成使人类栖居其中并得以长期生存的“世界”或工作产品，人类本身也由此成为工匠或“工匠人”(*homo faber*)。阿伦特认为，工匠人“不断地加工出各种各样的物，这些物在总体上构成了人工物世界”[4]136。实际的工作是在一种模型指导下进行的，客体是依照这种模型建构起来的。这种模型是人类意识把握的一个意象，也是通过工作使该意象具体化的一幅蓝图。这种意象或模型优先于加工过程，不随目的产品而消失，原本地保留进入以后无数的加工过程。这种出自同一模型的加工过程是“倍增”(multiplication)，是“已经相对稳定而持久地存在于世界中的物的倍增”[4]142。因此与劳动受制于生物循环的无始无终的简单重复不同，工作有着明确的开端和可预见的目的。由于这种可预见的目的，工作或加工是可靠的和可逆的，“仅仅凭着对未来产品的意象，工匠人可以自由地进行生产，而当再次面临双手工作时，他又可以自由地进行毁坏”[4]144。这样，工作便成为工匠人的“创造性破坏”或“颠覆性创新”活动，它通过其倍增机制开启了最大化技术发展议程。

工匠人创造的是可以毁坏的有形的持久之物，即使创造者离世也能完全保留下来。从人工物世界的这种持久性，阿伦特看到了世界的间性特征。人工物世界虽然“相对独立于其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且由此获得自身的“客体性”，但这种“客体性”又是相对于人类的“主体性”，从自然给予人类的事物中确立起来的，且为人类通过人工物表达其主体性提供了平台，因此人工物世界是“介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世界”，如果没有这种联系，人类便不可能拥有稳定的生活，而只能处于自然的无情的“生物运动循环”中。[4]137如果说人工物世界因其持久性打破了人类的自然循环运动的话，那么工作活动的客体性和持久性创造便成为技术最大化生成的长久机制。这样，工匠人不再如劳动动物那样集手段与目的为一体或既是工具制造者又是使用者，而是仅仅作为工具制造者单一地追求手段的有效性或工具化。这种工具化意味着将一切包括人和自然物纳入手段范畴或客体世界，“同样的工具，对于劳动动物来说，不过是减轻负担和使劳动机械化，对于工匠人来说，它们被设计和发明出来则是为了建立起一个物的世界，它们的适合性和精确性不是因主观需要和愿望而是因其发明所希望的‘客观’目标而强制性获得”[4]144。因此从工匠人角度看，无论是劳动过程，还是以劳动模式或意象进行的一切工作活动，其主导作用的力量是以最大化技术发展强化劳动的节奏、能力或效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机械技术的历史生成，实际上是以高级的自然力量取代人的劳动能力，使劳动动物进入机器系统中。从具体技术生成进程看，工匠人应被理解为现代“智人”，而工匠人的兴起则应被看作劳动分工的结果或产物。这样来看待工匠人，工匠人便不仅指古代工匠，而且也指现代意义的生产者、制造者、发明家、科学家、工程师、开发者和企业家等。也就是说，相对于劳动来说，工作代表着技术创造性生成的职业化兴起和发展。

劳动和工作虽然可以以个体的孤立活动进行，但它们并不能完全独立于人所处的世界或背景。阿伦特指出：“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人生活在地球上和栖居于世界中。”[4]7这一事实表明，人可以是个体的，但他的存在必须处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或价值关联中，此即人类多样性条件。与这种多样性条件相应的人类生命活动是行动。人类多样性条件具有相对平等和言说的双重特征，人们由此通过行动相互交流和理解并筹划未来。所谓行动是一种覆盖与他人互动的人类生命活动范畴，是在与他人交往中展示其独特能力、个人价值和创造新颖性的生命活动形式。这样，人类便由劳动动物和工匠人变成“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阿伦特为了将行动与劳动和工作严格区分开来，认为行动是“唯一无需事物或物质的调停而在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的活动形式”[4]7。这一命题表明，人对世界的经验只能在公共领域言说和表达其个性，它的悖论在于如果不借助他者，包括他人、他物和语言，人对世界的经验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事实上，阿伦特注意到“人类条件包含了较之赋予其生命的条件更多的条件”，因为“世界实在对人类存在的影响被感知和被公认为一种调节力量”[4]9。这里所谓的“世界实在”与纯粹的自然地球并不是一个东西，“世界”是一种纳入人类事务范畴的自然物和人工物世界。同样地，人类一方面作为动物世界的一员是有着生命需求的物种，另一方面通过建构超越纯粹自然的人工物世界创造了自身的生命条件。这样，“自然”便不仅是围绕生

死荣衰展开的循环进化，而且也包括对人类生命影响的人工物世界。如果没有这样的世界，人类就不能认识他者，唯有诉诸这个世界的稳定性，才能彰显其不同于动物的生命个性。由于“无数人生活在地球上和栖居于世界中”，所以需要诸如房子等各种人工物和稳定的人工环境。如果不能栖居于一个人工物世界和生活在地球上，人类也就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人类，也不可能获得表现自身个性的行动空间。只是这种空间本身在自然中并不存在，它必定是人工的和持久的空间或环境。在这种意义上，人类必须要将自然物改造为维持人类生命的持久之物，从而创造出这样的行动空间。反过来说，不仅人类通过行动而在技术生成中表达自身的创造性或个性，而且自然甚至历史生成的人工物也会作为这种行动的能动者进入到技术的生成中来。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跳转到: [2](#) [前往](#)

## 作者简介

姓名: 李三虎 工作单位: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李秀伟)

## 相关文章

[首页](#) >> [哲学](#) >> [科学技术哲学](#)

## 李三虎:技术生成的哲学解析

2018年09月12日 09:46 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李三虎

字号

[打印](#) [推荐](#)

### 三、自然物作为技术生成能动者

如果把生命看作技术生成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把技术生成置于人类生命活动范畴加以看待。由此我们非常容易导向一种实体理论,那就是将人类生命活动看作一种独立于自然的智力现象,把技术普遍地看作一种符合人类目的或促进人类生存的人工物制造及其相关的技艺和知识。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技术的生成是独立于自然的人类生命活动现象,自然物最多被看作技术生成和人类生命活动的外部条件。但是,如果把生命起源的本质看作动物世界应对周围世界的话,那么就需要将技术生成看作人类调停世界或进行物质安排的生命活动实践关联。进入到技术间性理论中来,我们必须诉诸这种实践关联反思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把技术生成与自然分割开来,而是把技术生成的历史看作一种人类的自然历史,重申自然物在技术生成过程中的不同在场形式和能动者角色。

毫无疑问,如果不能像技术实体理论那样仅仅把技术看作单纯的工具或手段的话,那么技术生成与人类生命活动必然是一种彼此嵌入、相互赋能和互为确定的关系。正如舍茨基指出,这样来看待技术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它能够达成这样一种认识:“技术的生成以这样一个常见事实为理由,即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与自然不同的人工环境中。智人或其祖先一旦认识到人类要有意识地参与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实物的操作和改造,则这种自觉就会激励人们无止境改变世界的努力。这个过程必然会首先引起对自然客体的人工改造,接着会导致人工物改造。它当然也会使实践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与技术相连,甚至以技术为中心。的确,人类实践一旦开始依赖技术、与技术相连和以技术为中心,这种情形就必然会永久保持下来并得到强化。”[6]91舍茨基并不像经典技术哲学那样表明,技术决定技术—人类复杂关系的永久存在和不断强化,或者技术逐步形成一种规定人类生活的必然文化系统,而是意味着“任何技术增长都与社会生活的实践和物质安排相协调,这种社会生活事态构成了各种新技术开发和引入以及与此相协调的实践和安排的起点,当然也构成了随后变化的起点”[6]91。技术生成的这种起点不仅仅涉及人类和技术本身,也涉及自然,“技术客体要么是对自然物变化而得,把自然物改造成为人工物,要么是对先前来自自然的人工物再造而得,因此技术的物性属于包括被分割为社会和自然的任何事物的被动物理化学层面”[6]92。与技术相关的一切人工物功能,均依赖于其自然物性。这一事实表明,技术的生成包含了人对自然的不断配置过程。

在生命进化过程中,最早生成的一些主要技术总是与在自然环境下生存、狩猎和食物存储相关。尽管低级动物也会使用一些“上手之物”(如黑猩猩为了取得蚂蚁做食物而使用的树枝),但使用上手之物(工具)与为了某一目的对手上之物进行加工毕竟是不同的。制造出一种适合切割和刮擦的工具是生命长期应对自然环境的结果,这种工具就其物性来源而言必须由硬的物质构成,而地球表面最易上手也是最硬的物质资源就是石头。无需使用工具而制造出石头工具标志着技术生成的历史开端,其关键是使石头具有锋利的物性。适合这种目的的石头类型包括砂岩、石英和熔岩,而最能形成锋利物性的是燧石。燧石的圆节易于碎裂形成坚刃,被制成适合切、割、刮、削、刨、钻的工具以及用于做箭和刨的尖头。这些工具反过来也使雕刻诸如鹿角、骨头等材料,制作更加尖利的工具或更加复杂的形状(如钩、针等)成为可能。在旧石器时代,这样制造的工具促进了以石器制造石器和其他材质工具的技术繁荣。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抛光的石头工具。其中,抛光的石斧被用来砍伐树林和农业耕作。石头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实际上代表着自然力的引入和利用。在石头工具使用过程中,通过燧石摩擦取火,是技术生成和发展的一个关键事件。它的象征意义是普罗米修斯盗火拯救人类,它的实际意义是使人类煮熟食物、取暖照明、驱赶动物、制造陶器和熔化金属成为可能。就金属熔化和冶金技术来说,铜、青铜、铅、金、银、锡甚至铁进入技术生成过程,成就了人类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火作为一种人工的自然力,燃料最初主要是秸秆、树枝和木料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燃料主要转向煤炭。工业革命的自然物前提之一,是在森林不断减少过程中发现煤炭可以用作木料的替代品。正如阿伦特指出的,“煤炭的发现以及用煤炭推动蒸汽机运转使人耳目一新”[4]148。从这种意义上讲,引发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技术发展,在原理上其实与对水力和风力的传统利用并无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它有了可以控制的优质煤炭燃料作为其动力来源。19世纪末期以后,电力的引入和发展尽管远

离煤炭燃烧动力和水力等自然力，但它同样不能与自然物完全分离开来。一座水力发电厂必须要建在有水流落差的地方，火力发电厂虽然不受空间限制，但它必须要通过相应的交通条件与煤矿发生联系。石油在成为重要的燃烧动力和化工产品制造来源后，便成为汽车技术、石化技术、精细化工技术等领域的重要自然物前提。同样地，当原子能引入后，铀矿成为核电技术的重要自然物前提。因此新的自然物和过程一旦被赋予世界性，便与人类生命活动结合起来，激发新的技术生成和变革。有趣的是，今天随着传统自然资源消耗剧增甚至出现匮乏，人们着眼于尽可能减少碳消费，转向环境保护技术、生态化或绿色技术与可持续技术发展后，便开始寻求新的可持续的、可循环的、可回收的自然物前提(如石墨烯、太阳能等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跳转到: [3](#) [前往](#)

## 作者简介

姓名: 李三虎 工作单位: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李秀伟)

## 相关文章



[首页](#) >> [哲学](#) >> [科学技术哲学](#)

## 李三虎:技术生成的哲学解析

2018年09月12日 09:46 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李三虎

字号

[打印](#) [推荐](#)

### 四、技术生成于间性的行动纲领

就生命活动来说,技术和自然物都是构成人类生存的条件。就技术生成来说,人与自然物同时在场或聚集于技术。这里的问题在于,人和自然物为什么和怎样进入技术生成过程?按照技术实体理论,技术外在于自身而生成,只有自然物才是内在于自身而自我生成。对于自然物的自我生成,亚里士多德以物质运动给予了说明:重物上升和轻物下降,也即物质运动源于自身物性,与外部世界无关。但是,牛顿力学三定律表明,物质运动并非如此:第一运动定律是说,一物运动状态因他物作用而改变,物的生成与外界密切相关;第二运动定律是说,他物作用对物的生成具有加速效应;第三运动定律是说,世界处于永恒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描述虽然坚持了中立的实体概念描述,但它显然超越了对自然物的个体或独立实体表述,将物质运动置于一种相互作用体系加以理解。在这一体系中,间性优先于个体,物质体系因这种间性存在而扩大。按照牛顿力学三定律,人工物的外部干预似乎可以理解为其内在生成的重要因素。这样,阿伦特的三种人类生命活动形式似乎可以以这样一种逻辑加以表达:一是“劳动动物”诉诸劳动,逐步将自然物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代表着技术生成的原始起源;二是“工匠人”诉诸工作,开始将人工物世界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表明技术生成的加速效应;三是“社会人”诉诸行动,将自然物和人工物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表明技术生成具有集体的扩张性特征。这种逻辑代表着技术生成的历史积累,它表明劳动、工作和行动不是先后替代关系,行动对工作、工作对劳动是一种包含或发展关系,因此技术的一切历史生成均会包含于当前的行动中。

牛顿力学第三定律要指明的是,对于每次行动来说,都存在着平等的和相反的相互作用。如果将这种作用用于人际关系说明,那么总是会出现愤怒引发愤怒和仁慈激励仁慈。这样,我们都来自他人的反馈方式,采取自身的行动。就技术生成来说,人和自然物都成为行动对象。经典技术哲学这里表明的是,技术并不是独立的实体或工具,技术生成于自行显现的“座架”,并为这一“座架”制约而成为工具,相信人能控制技术完全属于幻想;技术作为“座架”不是应用科学,也并不劣于纯粹知识,其唯一动力是使自然物合理化和成为持存物,从而能够定造和支配一切资源,甚至能够主导纯粹理论科学为其生成服务。这种本质主义的技术自我生成观点作为一种对现代技术的社会批判,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技术的生成究竟出于谁的行动执行动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诉诸间性理论,主张如下命题:技术生成于间性。技术生成涉及的一切因素,包括人与非人因素,都是“能动者”(agent)。这样,所谓技术生成于间性表现为技术行动纲领的如下三方面内涵:(A)能动者能够设想或被设想的目标、步骤和意向转换;(B)人和非人要素的能动者混杂构制;(C)构制技术的各种能动者之间的彼此赋意。

(A)表明了技术行动纲领的初始路线。劳动动物作为能动者,当面对饥饿、寒冷和生命威胁时,由于自身的身体缺陷(如人不如飞禽快,不如走兽强壮等)和自然物本身的稀缺或数量难以满足要求,所以往往会求助于其他能动者,如利用自然物或技术人工物,以便达到吃饱、取暖和保护生命的目的。这时劳动动物和自然物或相应的技术人工物,便会形成新的复合能动者。一旦复合能动者形成,便会出现多重目标选择。例如,人类最初制造弓箭是为了狩猎,但人和弓箭的复合能动者形成之后,就会出现杀人的新目的,此即目标转换。拉图尔指出,这种目标转换意味着“代替、分割、发明和调整,也即一种以前不曾存在的关联性创造,它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能动者”[7]32。这里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目标倒不在于如拉图尔所主张的具有不确定的对称性,而在于它们的相对性转换代表着能动者的相对生存变化。人类的本质是生存,生存就是行动。在这种意义上讲,人类的生存能力不会固定不变,否则技术不可能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如果以技术来定义人,那么人就会进入一种制造和使用技术的联系序列。在这种序列中,人因为技术或多或少会变得不同,技术也因为人而不断进入新的生成过程,自然物则因人和技术而具有世界性。因此尽管主体/客体之分始于它们各自的本质性生存,但按照这种起点却无法对技术间性进行测度,因为对于技术生成的间性意义而言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主体/客体之分。

按照(A)的技术行动路线,不同能动者被配置了不同行动,且具有不同功能或目标。在这里,能动者与行动者(actor)似乎都可适合于指称人的因素,对非人要素则有些不太习惯。也许用“行动体”(actant)来称谓参与技术行动的那些实际物,如自然物、人工物等,更为妥帖一些。技术行动的目标与功能也存在着类似区分:目标更为接近人的关系,功能更为接近与非人因素的关系。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并不能对目标和功能做出明确区分(例如,人们并不能识别用以杀人的枪或弓箭、用以计时的钟表,究竟是出于人的目标还是出于人工物的结构-功能所指),便只好将它们统统归于技术行动纲领,或(B)的能动者混杂。这种混杂情形,迫使我们必须放弃那种“阻碍我们正确理解不同技术甚至不同社会的主体-客体二分方法”[7]34。技术行动的责任和动机源自不同行动体之间,“任何一种行动的原动力都包含了一系列新的实践配置和构筑,但也许只有当我们尊重被动员进入这个清单的所有行动体的中介角色时,这一系列实践才能形成一个总和”[7]34。对于工具的发明、制造和使用来说,无论是在动物世界还是在人类世界,无论是在前历史或历史场景还是在现当代实验室或企业中,某一能动者总是会设想一个目标或多个目标。其中的一个目标一旦被直线路径缺口打破,就会寻求技术行动迂回路线——观察、发现和试错等,以便争夺其他能动者(如木棍、石头、火、电流以及同伴或合作者等)资源,返回到原有任务,突破障碍,实现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行动纲领包含一个或多个彼此建构的亚纲领。例如,黑猩猩取得一支木棍,发现较为粗糙,在经历危机之后,便考虑另一亚纲领,就是削尖木棍,创造一条通向尖木棍的发明路线。尽管这会产生许多其他不同结果(如初目标会在各种亚纲领中迷失等),但我们仍然可以重拾初始任务,只是其行动路线每往前走一步都会变得更加复杂和艰辛。这里执行技术行动的是能动者,技术行动是诸多能动者密切配合的能力结果。例如,黑猩猩取得香蕉,这种能力被尖木棍授予。技术行动并非仅仅属于人的能力范畴,也是不同行动体关联的能力所在,因为不同行动体被赋予临时的行动者角色表明,它们在能力交换过程中为彼此提供新的能力、目标和功能。

当我们强调技术生成于其行动纲领和能动者的间性角色时,这并不是说技术生成是一种稳态的世界展示过程。技术生成是一种意义生成,而这种意义生成源自跨越符号与物之间的普通边界的特定连接,即(C)设定的能动者之间的彼此赋意。校园道路工程师设计减速带并置于通过校园的道路上,是为了让车辆驾驶人穿越校园时减速以避免撞伤学生,但驾驶人可能会将这一目标转换为穿越校园减速以确保自己的车辆不致被罚和扣车停驾。这两个目标完全不同,减速以免撞伤学生诉诸个人的德行、开明的无私和提醒,减速以免车被停驶则出于纯粹的私利和反射行动。这种自利的动机,使驾驶人从鲁莽变为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在特殊路段下,这种减速带符号提示并不能确保所有驾驶人都能减速行驶。在这种背景下,校园道路工程师以混凝土墩取代警告牌,强制性地提示驾驶人绕道而行。这时校园道路工程师的行动纲领——提示驾驶人在校园内减速行驶,是以混凝土墩获得减速行驶的物质表达。这意味着人作为能动者将其意志施加于非人的物质关系上,而非人要素作为能动者则以绕道的概念实现目标转换和功能再造行动。可以说,技术就是在能动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彼此赋意过程中,不断地重塑其行动纲领,推动技术实现精致化发展。

#### 原文参考文献:

- [1]李三虎.试论技术人工物的实在性[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35(9).
- [2]HALLWARD P,STIEGLER B.Technics of Decision:An Interview[J].Interview with Peter Hallward.Trans.Sean Gaston.Angelaki,2003(8).
- [3]STIEGLER B.Technics and Time,1:The Fault of Epimetheus[M].BEARDSWORTHER,COLLINS G,Tran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 [4]ARENDT H.The Human Condi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 [5]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6]THEODORE R.Schatzki.Nature and Technology in History[J].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2003,42(4).

## 作者简介

姓名：李三虎 工作单位：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责编：李秀伟）

## 相关文章